

# 序

周質平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

最近二十年來，「漢語熱」成了美國外語教學界的一個熱門話題。鴉片戰爭之後，只有中國人學外國話的份兒，哪兒有外國人學中文的事呢！而今風水輪流轉，外國人居然也學起漢語來了。五四運動以來，被許多中國知識分子指為中國進步絆腳石的漢語漢字，在經過近百年的批評、摧殘、改造之後，居然屹立不倒，還在世界各地亮出鋒頭。這絕非當年主張廢滅漢字，提倡拉丁化的學者專家所能夢見。

漢語漢字之所以由「冷門」變成「熱門」，絕非因為漢語漢字的內在結構起了根本的變化。而是中國已經由一個被列強瓜分的次殖民地，一變而成了雄峙於東方的大國，無論在經濟、軍事、政治、外交上都有了舉足輕重的地位。漢語漢字成了外國人了解中國必不可少的工具。五四知識分子常有因果倒置的論斷，以為中國的復興端賴漢字的改革，而不知漢語漢字的復興實有賴於中國的復興。

隨著學習中文學生的快速增加，漢語教學成了學界一個新的關注點。在對外漢語教學界，每年在世界各地舉辦為數可觀的教學研討會，但至今還沒有探討過從學習者的角度，來談談學習中文對他們一生和工作所產生的影響。

「怎麼教」、「教什麼」，固然很重要，但是「怎麼學」、「學什麼」，為什麼當今從事中國研究或在中國經商、工作的人需要學中文？學了中文，對他們的一生和事業有什麼樣的影響。這些問題和「怎麼教」、「教什麼」至少有同等的重要性。如果我們始終只能從教的角度來研討推廣漢語教學，那不免還是「老王賣瓜，自賣自誇」，對外國學生來說是缺乏說服力的。為了打破這種一偏之見，我的老朋友、老同事林培瑞 (Perry Link) 教授和我在 2016 年 10 月籌組了一個從學習者的角度，來探討中文如何改變了他們的一生和事業的研討會。

在近一年的籌備中，我們請到了當今美國學術界、商業界、法學界、外交界、新聞界和政界，在各自的專業領域裡卓有建樹的學者專家十八人，他們的中文造詣也是一時之選。中文在他們的學習、研究和工作中都占著重要地位。我們請他們現身說法，談談漢語學習和他們的中國事業有怎樣的關聯。

受邀的十八位專家學者都在會前遞交了英文論文。研討會分為五組進行：

第一組四位發言人，有三位是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其中加州大學河濱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的林培瑞教授是研究現當代中國文學和文化的，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 的田安 (Anna M. Shields) 教授和紐約州立大學奧爾本尼分校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Albany) 的何瞻 (James M. Hargett) 教授是研究唐宋文學的。俄亥俄州立大學 (Ohio State University)

的安雅蘭 (Julia F. Andrews) 教授是中國藝術史專家。這一組由我主持。

發言的四位學者對中國語言和文史的興趣分別是從六、七十及1980年代開始的。在時間上或有先後，但都是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在經濟上還很窮困的時候。他們的動機是出自好奇和知識上的追求，而不是功利的。這組發言強調了中文學習對學術研究以及對認識中美語言文化差異的重要作用；同時還強調了準確的發音和優秀的教師，對提高學習者中文水平所起的至關重要的作用。

第二組是美國在華的三位商界人士，包括跨國製造企業 The Crane Company 駐中國的總裁高傑 (Geoffrey Zinsbart)；麥當勞公司前在華高管、曾任美國在華商會主席、現任高爾夫球美巡賽中國區副總裁的葛國瑞 (Gregory Gilligan) 以及《財富》(Fortune) 雜誌中文版前主編高德思 (Thomas Gorman，因未能與會，林培瑞代為發言)，主持人是林培瑞教授。前兩位發言者均以流利、準確、自然的中文演講，對目前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如數家珍，娓娓道來，凸顯了長期生活在中文語言環境中對其中文水平，特別是口語表達產生的重大作用。高傑認為良好的中文溝通能力使他在工作中能夠有效化解中美雙方的矛盾，敏銳把握市場變化的細節，實現企業與員工以及中美兩國貿易交往的雙贏。葛國瑞認為在中國的長期生活不但帶來了事業上的成長，而且帶來了個人家庭生活方面的豐收。他不但有一位美麗、聰慧的中國妻子，而且還有兩個在雙語、雙文化環境中成長的混血兒女，中國的生活經歷和教育背景為兒女的未來提供了更大的發展空間。

第三組是美國各大新聞機構的駐華記者、主編，包括美國《紐約客》雜誌的知名撰稿人何偉 (Peter Hessler)，他的「中國三部

曲」——《江城》(*River Town: Two Years on the Yangtze*)、《甲骨文》(*Oracle Bones*)和《尋路中國》(*Country Driving*)，獲得過美國多項紀實文學大獎；張彥(Ian Johnson)目前是《紐約時報》、《紐約書評》、《紐約客》、《國家地理》的撰稿人，2001年曾獲得美國新聞界的最高榮譽——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馬潔濤(Mary Kay Magistad)，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ational Public Radio)的記者，1990年代初她設立了該廣播電台在中國的第一個分支機構；《新聞周刊》(*Newsweek*)記者劉美遠(Melinda Liu)，曾經歷了當代中國的許多重大歷史事件，並曾採訪過鄧小平。這組的主持人是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的孫朝奮教授。因工作性質的關係，這組發言者的文章、書籍、時事報導對美國公眾產生了廣泛而重要的影響。發言者認為直接用中文採訪新聞事件的當事人比借助翻譯或者英文，往往更能產生推心置腹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霧裡看花或者轉用其他新聞機構的素材進行寫作造成的弊端，因而更能真實地反映中國社會的本質。

第四組是從事法律與政治專業領域教學與研究的教授，包括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中國法律問題專家柏恩敬(Ira Belkin)教授；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法學院郭丹青(Donald Clarke)教授；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系從事中國政治研究的祖若水(Rory Truex)教授。這組的主持人是聖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的朱永平教授。發言者認為中美法律體系、政治體制不同，所用術語差別很大，因此很難用英文做簡單對應的翻譯。由於法律工作的特殊性，從業人員必須對中文有非常準確深入的理解才能滿足工作需要、減少差錯。

第五組是在美國各政府部門任職的官員，包括前聯合國駐華官員畢儒博(Bill Bikales)，他用無可挑剔、準確而流利的中文進行了極為生動、感人的演講；葛思亭(James I. Gadsden)曾就職於

臺灣的美國貿易中心 (US Trade Center) 並任美國駐冰島大使；馮若誠 (Owen Fletcher) 曾在中國工作多年，目前在美國駐越南使館任職；朱思敏 (Julian Smisek) 現任職於美國駐華使館。這組的主持人是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 劉樂寧教授。發言者認為，美國人需要打破英語是世界上占最主導地位的語言，因此各國人民都應該掌握、運用英語與美國人交談的成見。語言交流的平等是國家互信和平等相待的基礎。學好中文還有益於掌握日文、越南文等其他亞洲語言，在馮若誠看來，中文類似於亞洲多種語言中的「拉丁文」，是日文、韓文、越南文的源頭，中文為他個人的職業生涯開闢更為廣闊的道路。<sup>1</sup>

在這十八位發言人裡，我們可以清楚地感覺到他們對中文和中國文化都懷有一份溫情，用英文來說是一種 passion and love。正因為有了這份溫情，才能對他們所研究的對象有一份敬意和一種同情的了解。我借用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開篇中的「溫情」和「敬意」這兩個詞，並不是要研究者失掉客觀的立場，而是希望一個外國的研究者能透過中文，從中國人的角度，設身處地的來探討他所研究的問題，否則就成了「隔靴搔癢」。

在中國從事研究或工作的外國人，如果他日常的行事都必須依賴翻譯，其結果不只是「隔靴搔癢」，不得要領；尤其嚴重的是，他所觀察到的一切，都不免是「霧裡看花」，終隔一層。這一層也許薄如蟬翼，但真相卻常常因此隱去。已故哈佛大學教授楊

---

1 以上會場實錄，參考並採用了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東亞系梁霞、秦子寒、譚彥冰合寫的〈普林斯頓大學「漢語能力與中國事業」研討會召開——記中文教學界首次舉辦成功的中文學習者座談研討會〉，《國際漢語教學研究》，第1期(2017)，頁93-94。謹向梁霞老師致謝。

聯陞在1960年中美學術合作會議(Sino-American Conference on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上，對那些駕馭中文材料能力不足的美國學者，很含蓄幽默地指出，對原文沒有透徹的了解，卻妄下評論分析，其結果往往是「誤認天上的浮雲為地平線上之樹林」(mistake some clouds in the sky to be forests on the horizon)。<sup>2</sup>

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這次大會發言者的共同經驗是，翻譯不但不是萬應靈丹，有時還可能造成誤會，鬧出笑話。

以中英文雙語寫作而知名於海內外的作家林語堂，在《從異教徒到基督徒》(*From Pagan to Christian*)一書中，對中英文的不同，有深刻的觀察，他說：

There was something in the character of Chinese language which invisibly but most emphatically changed one's mode of thought. The modes of thinking, the concepts, the images, the very sounds of words are so different between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Chinese.<sup>3</sup>

在中國語言裡有一種見不著，卻極有力地改變一個人思維模式的成分。由這些成分所形成的思想、觀念、形象和語語的聲調是如此有別於英文。

林語堂所說這種看不見的巨大不同，是很難透過翻譯表達出來的。要感覺出這點不同，必須在中英文兩個語言的環境中有過長期的浸潤和沉潛。

---

2 蕭公權著：《問學諫往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2)，頁64。

3 Lin Yutang, *From Pagan to Christian* (Cleveland and New York: The World Publishing Co., 1959), p. 58.

林培瑞在他文章的最後用園丁種花的生動形象，來說明語言教學帶給他的快慰和滿足。初級語言課的老師都是播種者，最初播下去的只是一顆語言的種子，語言一般都只被看作是一種工具，但在茁壯的過程中，這個在表面上看來只是工具的種子，會漸漸吸收可觀的內容，這個內容可以是古代中國的哲學、文學、藝術、歷史，也可以是現當代中國的政治、社會、外交和商業。工具加上內容之後，是可以改變一個人的思想和觀點的。而這個新的思想和觀點可以為每一位外語的學習者提供一對新的眼睛、一雙新的耳朵、一張新的嘴巴和舌頭。有了這些新開的竅，我們接觸到的是一個嶄新的世界。

在收入本書的十七篇文章中，有一點是共通的。就是每一位講演者在回憶中都提到，學習中文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他們的一生，也影響了他們的事業。無論是學術研究，還是在商業、外交、新聞各個領域，他們的工作和中國是分不開的。而這個關係的建立，往往就在他們初次接觸到中文的時候，便已播下了那顆種子。

在對外漢語教學界，我們往往過分強調語言的工具性，而忽略了語言背後所承載的內容。這個內容應該是中國的哲學、文學和歷史，而不僅僅是節慶、習俗、剪紙和中國結。這次研討會的十八位發言人為這一點做出了最好的見證。一個真能學好中文的外國人，他必須對中文有一點癡，有一點陶醉。這讓我想起，林培瑞對相聲的熱愛，他曾多次在我家和其他北京來的老師表演侯寶林的《戲劇與方言》，他用幾乎亂真的北京話演繹著侯寶林那膾炙人口的片段。在他表演的過程中，與其說是娛人，不如說是娛己。他的那份陶醉是我始終忘不了的。

學好一種外語，精通一種外文，需要一點「癡」，需要一點「陶醉」。這點「癡」和「陶醉」我們在十八位講演者身上都看得很

清楚；有幾位早年都願意忍受生活上種種的不便，到中國去學習研究。對艱難困苦甘之如飴的態度就是我所謂的「癡」和「陶醉」，這也就是孔子所說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這兩句話裡，最關鍵的一個字是「樂」。「樂」字，相當於英文的enjoy，也就是「樂在其中」。學習任何東西，一旦達到這個境界，就欲罷不能了。

但是這點「癡」和「陶醉」，在我們對外漢語的課程裡面卻不見蹤影。「商用漢語」、「法律中文」是不可能讓學生「癡」，讓學生「醉」的。我們過分強調學習中文的實用性和功利性，結果整個學習的過程成了技能培訓。學生很難從語言的學習中感受到知識的快樂和智慧的增長，結果是只感覺其難、感覺其苦。

紐約大學法學教授柏恩敬在回憶自己學習中文的過程中提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早期，中國大陸正籠罩在文革的恐怖之中，而蔣介石治下的臺灣，此時也正在戒嚴法的管控之下，談不上什麼民主自由，對一個年輕的美國人來說，海峽兩岸與發財致富是絲毫扯不上關係的，但柏恩敬正是在此時開始全力學習中文。他覺得愛上中文類似於談戀愛，與其說是一個理智的決定，不如說是一種感情上的愛好，這種不以實用為出發點的學習動機，往往更能持久。他每學一個新的漢字，就覺得又解開了一個謎，又多了一把通向了解中國文化的鑰匙。讓他最感快慰的是他說出了一句字正腔圓、用詞得體的中文，讓他的中國朋友對他忍不住的讚嘆。我和恩敬是四十多年的老朋友，這是一段非常寫實的剖白。

英國哲學家羅素 (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 在 1926 年出版的《教育與美好生活》(Education and the Good Life) 一書中對語言教學的一段話，至今對我們還有極大的參考價值：



In a mechanistic civilization, there is a grave danger of a crude utilitarianism, which sacrifices the whole aesthetic side of life to what is called "efficiency." Perhaps I am old fashioned, but I must confess that I view with alarm the theory that language is merely a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nd not also a vehicle of beauty.<sup>4</sup>

在機械化的文明裡，粗糙的功利主義造成重大的危險，即為了追求所謂的「效率」而犧牲了生活中的美感。也許我有點兒老派，但我必須承認，把語言僅視為一種交流的工具，而忽略它同時也是一種美感的承載，對此，我是深感憂心的。

我所說的「癡」與「陶醉」大都來自語言的「美感承載」，而不僅僅是「交流的工具」。「交流的工具」是「有用」，而「美感的載體」則是「可愛」、「可驚」、「可佩」。學習一種外語，讓人感到它是一種「交流的工具」，是不難的；但讓人同時感到它也是「美感的承載」就不容易了。「交流的工具」，是任何初級入門的學生都能體會到的；但「美感的承載」，即使皓首於外語研究的學者也未必能有所體悟。

近年來，中國政府在推廣漢語教學和中國文化的介紹上，花了大量的精力和金錢。在世界各地成立數百所的孔子學院就是最好的說明。但我們的關懷似乎過度集中在普及上，而沒有在提高上做出足夠的努力。我們這個研討會帶給大家的啟示是，提高才是真正力量之所在。沒有提高的普及，至多只能形成一個人多而勢不眾的局面。但提高往往需要長期的投資，默默的耕耘，不能求速效、速成。

---

4 Bertrand Russell, *Education and the Good Life* (New York: Horace Liveright, 1970), p. 31.

在這次受邀的十八位發言人中，他們大都有流利的漢語水平和成功的中國事業；在回憶中他們也都將中國事業的成功歸功於流利的漢語水平。這當然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但在欣慰之餘，也別讓興奮沖昏了頭腦，以為中文真有了國際語言的地位。這不免又偏離了中文在當前世界上實際的處境。

在林培瑞文章的結尾處提出了一段發人深省的問題，我們什麼時候才能看到在西方世界，比如說在亞洲協會年會中，一個中國學者用中文來發表有關王陽明思想研究的文章，而與會的其他外國學者也都能用中文來進行提問和討論？至今在學術界裡還瀰漫著一種風氣：即使是中國研究，也只有用英文發表的學術著作才是真正嚴肅的研究。

其實這個會的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林培瑞的觀察。這個研討會的總題是：「How and Why Language Learning is Useful in China Careers?」（為什麼中國事業需要學習中文？）。這個题目的本身就暗示著，還有許多人認為中國研究或在中國工作、生活是不需要中文的。我們如果把這次研討會的主題改成「How and Why English Learning is Useful in USA Careers?」（為什麼美國事業需要學習英文？）大家都會覺得這還用討論嗎！換句話說，這個研討會一方面說明了中文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卻也體現了中文要成為一個真正國際上承認的通用語還有很長的路。我們需要努力的地方正多著呢！

本書的出版，要特別感謝每一位與會的專家學者及各組主持人的全力配合，會議的成功召開，除了普林斯頓北京暑期漢語培訓班在經費上全力支持以外，要特別感謝培訓班的總管趙揚（Henry Zhao）先生細緻耐心的籌劃和安排。論文集由楊玖老師擔任中譯的工作，楊老師中英文造詣深湛，又有多年教學經驗，是

最合適的人選。她態度嚴謹，幾次和原作者往返對勘，力求符合原作。沒有她辛勤的工作，本書是不可能在此時出版的。

2017年9月25日修訂

於普林斯頓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